

筌路维艰

新民主主义时期

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之中，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才得以出现。可事实上，也许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较弱的缘故，20实际的共产主义革命大多发生在落后的农业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了使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

后人也许难以相信，改革开放的第一代设计师也许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从而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铺垫。

新民主主义给予私人企业合法地位，鼓励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走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道路。政治上则是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也在建国伊始的联合政府中得到体现。这里的人民除了包含工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也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会有侧重的发展国营经济培养起成为经济的领导力量。其次，对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最后，在中国这个农民为主要的国家发展互助合作，避免两极分化。这几点其实在当今的中国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之所以说是毛泽东首创，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共产主义之前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而是在保证政权主体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同时，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这种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革命的，对社会主义有利的。

整体上的思路概括为：遵循历史规律，不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引导利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领导人有两个评判标准：一个是从物质生产力发展情况来看，另一个则是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前景的接受情况。虽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人民的主观意志显然也可以通过教育等软性手段施加影响。这方面的认知对于后面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影响。

但是在实践中，新民主主义政策和执政人心理以及现实环境存在一些张力，导致新民主主义只存在了短短不到四年就沦为历史：

1. 新民主主义可能催生出资本主义思想，从而使人心背离社会主义路线
2. 新民主主义可能壮大资产阶级，从而改变“敌我”平衡
3. 新民主主义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理想不符

从历史上看，这几项担忧虽然可能被某些因素放大了，但是都能对应的找到历史依据。

首先，并不是所有党员都对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一个以消灭剥削为使命的政党内部，许多党员都有着质朴但是不切实际地希望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

土改之后，很多农民积累了一定财富，并且倾向于单干，使得很多干部担心农民们一旦尝到了个人发财致富的甜头，就会对社会主义前景产生动摇，因此经常出现“趁穷的时候过渡，富了就不

好过渡的想法”，导致一些地区希望借着刚刚土改完的热情趁热打铁，快速开启合作社模式。企业家们对于这样的信号非常敏感，不少人害怕被“共产”，停工，搬迁或者直接主动上交财产的不在少数。中央为了安抚紧张的企业家亲自出面澄清中央对于私企的态度，刘少奇甚至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说法，表示资本的发展是有利于当前局势的，而毛泽东对这个言论不满的反应也为后来二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这样的背景助推了合作社的提前出现。本来，高层中存在“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共识，认为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支撑大集体式的生产。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可以证明即使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集体化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尽快走上合作社的道路，更何况合作社还有着动摇私有制的作用。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历过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正符合这个假设。

转折

合作社的加速推进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都加速了新民主主义的结束。

之前我们说过，对新民主主义的很重要一个担忧是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对资产阶级思想蔓延的担忧。而1951年底的贪污案以及存在的资本家勾结政府官员的现象则强化了这个担忧，使得毛泽东发起了党内三反运动，以及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使得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掌控进一步增强，毛泽东也认为，资本主义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离不开共产党了，而我国已经做好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

苏联模式时期

苏联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模板，1953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和苏联模式非常接近。

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尽管发展重工业提高国力一直是中国近代领导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对于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顺序高层还存在一些分歧。刘少奇认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起步不仅对于资金的要求少，而且可以改善民生，同时也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吸引毛泽东的一点则是，如斯大林所说，从轻工业起步过于缓慢，而发展重工业可以加速赶超。

帮高层真正达成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中国出兵朝鲜使得苏联方面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并给予大量援助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得党内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更加悲观，进而有必要尽快提高国力。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止是一个单单的战略选择，其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因为：

1. 需要压低消费，提高储蓄率，积累原始资金
2. 集中资源于重工业

3. 平均的民生保障以维持社会稳定

统购统销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推动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1952年底已经出现了多地抢购粮食，价格飞涨的情况，仅仅依靠市场收购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困境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经济作物产区扩大，粮食配给供不应求。同时，国家不希望持续的物价波动和更多的财政花费，以助于影响工业化进程，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实施征收农民余粮的政策。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完成原始积累，农民变成了最大的贡献者，或者说，牺牲者。统购统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紧张，当然部分地区也出现了粗暴施政等现象，但这项政策的影响不止于此：统购统销在后期逐渐变成了一个引导农民过渡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工具，并且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货源，也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受到打击。

走向高潮

合作社从发起到走向高潮，经历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毛泽东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论述提供了支持开展合作化的依据，而具体的推进速度则一直由邓子恢把控在一个较平稳的节奏上，部分地区关于强迫入社，生产情绪不高的报告也让毛泽东希望放缓节奏。然而，毛泽东的南方视察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观察到不少地区庄稼长得很好，部分农民因为合作社推迟感到心灰意冷。因此，毛泽东决定加速合作社的建成，并批评了党内的“右”的声音，认为是他们在阻碍合作社的推进。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精神迅速在党内贯彻，加上各级领导对于计划经济，集体经济始终坚信不疑，各地方争先恐后地推进合作社，选择性的鼓吹农民入社的热情，合作社的丰硕成果，而这种趋势又在上下级的互动中越发不可阻挡。合作社的广泛建立为统购统销提供了强力的保障，使得资源集中于国家，私人企业不得不公司合并以维持生存，逐渐形成了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的经营模式；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城镇地区则形成铁饭碗制度。可以说，这套模式是区别于市场经济的一套计划经济模式，其根本就在于生产资料和决策权的高度集中，而合作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全方位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的形成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皆有体现。

政治集权体现在三个方面：

1. 联合政府到一党政府

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前的过渡状态。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他党派虽然仍然存在，但只负责提供建议，政协成为了各党派的协商机关而不再行使决策权。

2. 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实行六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之后，毛泽东参考苏联经验希望加强中央控制，减少区域分割，逐渐取消了六大区，改为全国统一管理。中国20世纪长期分裂的历史也让毛泽东对于山头主义有所提防。

3. 党接管政府事务

成立伊始，“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但毛泽东逐渐对政策制定时的分散主义，擅作主张感到不满。于是要求主要问题需要由党委讨论决定，政府执行，次要问题则由政府部门的党组接管。

文化层面也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一元化。

意识形态一元化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铺垫。这方面的改造主要体现在教育界：教育公有化，院系调整以引进苏联模式。改造的主要目标则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政治上又离资产阶级更近，难以信任。这就有了改造和使用并行的策略，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针对他们的思想改造。

社会层面则是完成了一系列社会整合：剿匪，土地改革，构建基层政权，收容改造一系列不当手段维生的群体，取缔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终结了中国政权止于县的长久状态。这方面的改造依托于几个基本制度：

1. 城镇街居制（使得管理覆盖到城市各角落）
2. 单位制度（公有制体制内人员组织的形式）
3. 人事档案（针对干部档案，便于管理）
4. 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减少，活动范围被控制在特定区域）

全力赶超时期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掀起了中国进入全力赶超时期的序幕：一方面，通过全体动员赶超英美，另一方面，通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赶超苏联。

对苏共二十大的思考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让中国开始思考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

1. 更灵活的经济体制
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发展轻工业农业以改善民生，甚至允许个体经济和分散经济作为补充。
2. 扩大民主
共产党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可能存在的危害，在扩大民主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在文化领域，鼓励百花齐放，学术自由，不少报纸重新交由民主党派承办，要和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体制上，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扩大地方权力，设立中央书记加强集体领导。对于个人崇拜，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当然，双百方针也有两条界限，就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以及自由只属于人民，不属于反革命分子。

大转弯

1957年，波匈事件爆发，不久后，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两个事件使得毛泽东的立场从原本批判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转为批评修正主义，并且重新开始强调阶级斗争。1957年发动的党内的整风运动，也正是这个逻辑演进的。

整风运动原本是一场动用党外力量冲击党内风气（官僚主义，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希望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政府和人民的紧张关系。但是随着国内部分地方相继出现罢课，罢工，退社的动荡，以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越来越多的出现，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暴露出一些右派和反共分子，整个运动开始转向，并将规模扩大到了广泛的人群当中。

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对于右派的担忧并没有那么严重，认为真正人群之中的最反革命也不过百分之一。然而，当把社会矛盾定义为敌我矛盾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个模糊地带。再加上群众运动本身的难以控制，以及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不信任，反右的扩大化就不可避免了。

全力赶超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对依靠知识分子发展的想法产生动摇，但却为他提供了发动群众的方法思路。此外，在国际上，苏联在美国之前发射卫星，并提出了和平竞争。而在国内，赶英超美，实现中国的复兴赶超则是全党全国一直的心愿。党内高层事实上对于进一步压榨民生加快发展有很多的反对，但是大多数受制于57年的反右运动，害怕被归类为“反动”的右派。在这个契机之下，大跃进开始了。

毛泽东的大跃进应该说是一种对斯大林模式改良的尝试，从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式管理变成了直接发动底层群众的动员式管理。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民众的热情事实上确实被调动起来，但是各地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狂热和为了迎合上级进行的瞒报同样层出不穷，造成了不尊重客观事实，官员滥用行政命令，浪费财力物力，资源分配失调等严重问题。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夸大报道中央领导人不可能没有察觉，但是对于这场运动本身来说，其本身又依赖于这种人定胜天的热情，因此没有对这类行为进行足够的制止，批评。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期的制度产物，它既满足了全民动员的需要，也是乌托邦理想社会的缩影。人民公社完成了小并大，私并公：将多个合作社进行合并，统一管理，其功能集教育，生产，政府于一体。由于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国家权力能够延伸到每一个社员，造成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等现象。这些弊端都植根于这种组织形式当中：资源的控制权，分配权都被更高的层级垄断，较低的层级受到更高的层级的支配。

饥荒

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59-1961年的饥荒，大批农业生产力使用粗劣的手段尽心工业生产，粮食分配不均，自然灾害，生产效率低下，虚报瞒报引发的过高征购等原因合并造成了这个结果。庐山会议本来有机会及时做出调整，但是却演变成了一个针对反对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抹杀了及时刹车的可能性。

这些无不引起我们对体制的反思。整个体制的零部件，全能国家的控制力，上对下的选拔制度，生产力低下的人民公社，农业补贴工业的资源调度，统销统购，户籍制度，欠缺调节能力的计划体制，层层过滤的信息传递，共同导致了国家根据虚假的数据制定征收错误指标，上级官员强力，且过度征收农民的余粮补贴工业和城市人口，而农民又无法通过市场等方式进行资源交换，最终一并导致了这场灾难。

二次革命时期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党内干部实地考察农村情况。诸如刘少奇，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下到基层考察，所观察到的人民生活困苦给他们很深的触动，使得开始反思之前的政策。毛泽东并没有亲自下到基层考察，因此并没有对底层的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和其起因的更清晰认识，因而在后续的党内分歧中，认为党内干部对于基本路线产生动摇，因而重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党内分裂意见暴露了干部对于三面红旗的真实态度，批评了单干风，翻案风，站在意识形态的高点，使得党的方向又一次回到反修防修上。

继续革命

国际上，中苏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交恶，而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革，使得在毛泽东看来，维护纯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落在了中国的头上。

而在国内，毛泽东时刻提防着修正主义萌芽的出现：农村富裕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这使得他始终对于农民的单干风和官僚主义有所顾忌，并发动群众来对这些阶层进行冲击。然而，官僚主义根源来自于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和缺乏约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干部掌握大部分资源，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因此便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因此想通过发动群众来冲击特权阶层并不能根治这些问题。

到了1965年，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四清运动等都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其力度无法触及中央核心，而随着党内他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分歧不断加深，对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国家被资产阶级渗透的风险又有了更深一步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到的是使用一种自下而上，全面的，公开的动员来冲击僵化的体制，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人们造反，夺回被资产阶级拿走的权力：发动文化大革命。

何以发动文革

文革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整个中央领导集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这场运动的发生。首先，自延安整风以来，毛泽东在党内是绝对的真理代表，在重大问题上他始终拥有定义解释的权力。其次，文革涉及到两条路线的选择，其目的是利用人民群众来防范打击修正主义，这使得不同意见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无力反驳。第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所对照，党内高层基本都赞同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只是在手段上和侧重上有所不同。最后，文革的后续发展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大部分高层并不知道文革怎么搞，有些觉得不过是之前类似运动的延续。

群众如何卷入

文革并不同于历史上很多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破坏活动，而是一场自下而上地混乱的造反活动，而这些行动，是由毛泽东所授权的。因此在分析文革时，不能只单方面思考领袖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还要思考底层群众为何可以广泛的响应甚至扩大这场运动，他们是如何与领袖互相作用，影响的。

文革发生于当时高度政治化和封闭的中国，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单一，激进，人们也习惯于甚至积极地参加各种以社会主义为口号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主体是从小受到革命教育，具有强力的阶级斗争观念，革命志向，和激进的变革意识，并且推崇革命暴力的青年，这其中还有很多社会经验缺乏，容易被煽动的中学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政权的纯洁，保卫领袖的号召下，他们很快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文革的口号和目标除了和青年疯狂的革命热情结合，也和社会长期积攒的矛盾结合。文革中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引起了多年来人们被官僚主义欺压的共鸣，很自然地把毛主席当作了本方的利益代表，把腐化的政府机构当作要去批判的反革命。

文革的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的口号，还成了很多想解决私人恩怨，权力斗争的一把武器，他们以这场运动的名义，接着造反，攻击被这场运动合理化，来攻击，陷害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最后，文革作为一场大规模群体运动，也可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理解，诸如同化，群体认同，盲从等因素也推动了这场运动进一步扩大化。

应该说，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发起和允许的，自下而上的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内乱。这场运动得到了多方面诸如，国际环境，意识形态，政治氛围，底层矛盾，参与人群特质和一些社会心理因素的配合，最终造成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动乱。

破坏力的来源

文革期间各类暴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红色恐怖，派别冲突，刑讯逼供。

红色恐怖是红卫兵，造反派对被批判者的攻击。他们是破四旧，攻击“黑五类”的主力军，以革命之名进行大规模破坏性活动。

派别冲突是各类揭竿而起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有的冲突是因为认定对方群体的路线偏向了修正主义，但也有一部分只是单纯的缺少法律下的情绪化的群体性冲突，或者是无关意识形态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对峙，更有不少冲突是群众头目为了争权夺利发动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文革时权力的中空以及造反，甚至夺权的合理化。

刑讯逼供则是群众对部分人的法律之外的专政，关押，审判。取代法律的是民众在各地积攒的仇恨，不满和其他感性认知。

演变

文革本来希望通过群众的力量来打击党内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但却演化成一场全国的动乱。起初，毛泽东设想文革半年结束，后来变成一年，三年，最后却持续了十年。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各自“创造性”地听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巧妙”加以阐述然后为自己所用。此外，各类群体逐渐涌现，大多以响应毛主席为名制造混乱，趁势夺取权力。毛泽东本来希望利用自己的个人威望来动员群众发挥好的作用，却成了各类群体谋权夺利的大旗，并且进一步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其中就出现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二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林彪事件为终结。这次事件之后，也让毛泽东进一步陷入了恢复秩序和维护文革的困局。一方面，毛泽东也希望恢复国内的秩序，重用老臣，另一方面也要从大方向上维护文革的合法性。因此文革后期仍有一些小运动，但是已经很难得到党内和群众的支持。这一局面直到毛泽东离世才彻底得到改变。

改革开放时期

从1977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拨乱反正，真理标注讨论，思考经济改革，出国考察都逐渐开始。中国也得以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开始探索符合国情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

改革缘起

走向改革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除了最高权威的离世使得政治运动彻底结束之外，国内经济民生压力，国际大环境缓和，各类利益群体的打破，和毛泽东时期工业体系的搭建和大批具备基本素质的劳动力出现共同推进了改革。中央更是组织了一次集体的对外出访，外面世界的变化使不少干部十分惊讶，整个改革的推动总体来说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思想领域也在进行着改革，从讨论真理的标准开始，一步步扩展到对于建国以来历史的全面反思，并为了防止重蹈历史做出了诸如抛弃个人宣传，强调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党内监督等重要改变。

华国锋虽然也有着改革的愿望，但是在能力，资历以及与文革的关系中都相较邓小平处于劣势，实际权力也逐渐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应该说邓小平是一个很务实，并且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人。他恢复高考，恢复留学生，从专业，知识分子中提拔干部，尊重人才，放开了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同时，邓小平也始终致力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保持国内的统一稳定，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西方的民主模式，这也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渐进的市场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的经济改革有诸多不同。首先，中国的改革次序是先经济后政治，这保证了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协调者和画线者的角色。其次，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谨慎态度，主要照顾多方利益，在对国有经济破坏较小的情况下，鼓励其他经济形式从“体制外”生根发芽。农村方面的经济改革更是卓有成效，底层农民（诸如小岗村）的冲击和领导人的相互推动使得一些实验变成了全国性政策。包产到户不仅给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还保证了农民不担心单干时会产生的困难。中央对于包产到户采用了先观察后评估的策略，在看到成效后再进一步推广。

农村的突破还推动了市场化，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产品生产的农户，开阔出城乡的农贸市场，同时催生出一大批乡镇企业。

中国的改革还得益于对外的开放。中美建交，中日和解，经济全球化等等都为中国改革创造了条件。

对外的开放让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接轨，引入外国资金，成熟的技术。但也不应该忽略中国自身的优势：稳定的政府，社会，较低的通货膨胀，开放的友好的政策，低廉的土地租凭和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对外开放还让中国引入了市场的规则，有沿海到内陆的渐进改革让官员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少放任不管，而是要制定好劳动力，工资，产权，土地使用，资本市场，外汇等一系列要素的框架，规则。最后，外国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思想上的启发，使得中国的决策者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工具库，民众也在思想上更加多元活跃。

深化改革

1980年代末，随着体制外的改革遭遇瓶颈，关于是否进一步改革的讨论又一次出现。进一步的改革不仅会改变原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三大戒律，还将出动不少体制内的人的利益，也有保守力量担心继续的改革会使中国走向苏联和东欧的休克道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在这个关口对这些声音做出回应：要想巩固社会主义，就需要发展民生，经济，提高生产力，不能把市场和私有制等同于资本主义，要借鉴一切有利经验学习，为我所用。这样的声音代表了高层对于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度过了临界点，转向体制内，之后的价格市场化并轨，分税制改革，资本市场的建立也随之发生，随着中国2001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迎来腾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梦想

共产主义梦想是20世纪风靡几乎半个地球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憧憬着这样一个社会，但他们都不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会发生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也不认为人类发展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但在实践中，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却明显急于进入到共产主义，忽视了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列宁在遭遇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滑铁卢后，只得策略性地使用新经济政策过渡，但在斯大林上任后这些政策又被废除。而毛泽东不但不认为落后不利于社会主义，反而把贫穷当作进入社会主义地有利条件，应该趁着贫穷加速过渡。再结合中国经历百年国耻，长期分裂和紧张的20世纪国际局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集权化，意识形态一元化，和加速赶超等激进思潮的产生。同时，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和经济危机加深了人们对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任。

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僵化的封闭的体制，它不断吸取着共产主义者诉求的价值，工具，增加福利制度，累计税，完善人民基本权利，不断地修补完善着这个原本破绽百出的系统，并逐渐赢得了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体制竞争。

于此对比，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经济的停滞，计划经济因为无法获取完全信息，无法对事物发展做出完全计划，无法满足社会群体的多元需求，无法解决激励问题，以及抹杀个人自由等原因逐渐暴露问题。而在社会层面，过于集中的权力和阶级斗争的强调造成了权暴力的滥用和普遍的官僚主义，革命理想和激进的社会氛围以及法制意识的淡薄经常让人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实行法律之外的对部分人的专政。毛泽东对此的办法是发动群众来监督，限制政府，但却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和群众之间的互相伤害。传统的社会主义因为高度集中的权力，始终缺乏和平的权力交接的机制，使得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这些都使得中国开始反思中西方的经验，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1978之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不应该将苏联模式当作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很大程度上重拾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思

路，同时又根据自身国情进行进一步的超越。

在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路上，也要注意回应两个重要问题，都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先是要想办法遏制公权力私有化。一方面，中国体制权力仍然较为集中，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如果资本和权力任何一个都已足够危险，资本和权力的互相勾结就更应该及时遏制。

此外，就是要注意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商业的发展借助于也推动着商业逻辑在社会的传播，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一系列衍生的诸如腐败，诈骗走私等乱象的产生，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价值空洞。显然，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全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重道远。